

思想周刊 / 学习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把握“变”与“不变” 推进高质量发展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 本报记者 周宇晗

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公布,明确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主要目标、重大战略和政策举措。如何认识“十四五”的重要地位?怎样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浙江又该如何全面对标《建议》谋篇布局“十四五”?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十四五”时期的“变”与“不变”

记者:《建议》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与前几个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在您看来,“守正”的是什么,“创新”的是什么?

赵振华:我从几个“变”与“不变”来阐述:

根本的指导思想不变,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根本保证不变,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展的目的不变,要求坚持人民至上,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大的布局、理念和总基调不变,依然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要求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建议》既有继承,也体现创新。比如,更加强调主动识变应变,提出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更加强调系统思维,过去宏观调控主要针对经济领域,现在已涵盖产业、科技、生态、安全等各领域;更加强调新旧动能转换,过去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实现发展,这次则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作用”;更加强调协同融合,提到政策协同、治理协同、城乡融合;更加强调安全韧性,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

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针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把握这些“变”与“不变”,就要深刻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和阶段性要求。

一方面,“十四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四五”时期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十五

五”时期就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才能为“十六五”时期、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倒排时间表,“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不动摇,同时在经济如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另一方面,“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国际看,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大国关系变化,中美博弈从经贸向关税、科技等领域拓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高端攀升,中美贸易从互补共生转向战略竞合。因此,我们的应对策略,也要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主动”。从国内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同时,也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人口结构变化等挑战。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既看到优势长板,又看到短板弱项;既要明确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变,又要认识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以此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

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硬道理”

记者:《建议》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您认为,“十五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核心内涵和具体抓手?

赵振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当然也是“十五五”的“硬道理”。从《建议》来看,“十五五”时期推进高质量发展,既要重视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等体现量的指标,也要重视产业结构、人均GDP、碳排放等反映质的指标;既要推动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也要推动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及相互协同。

一是强化理念引领。在《建议》中,高质量发展既是指导思想,也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时,必须把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思想、正确方法、评价标准贯穿始终。其中最重要的是完整准确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二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12个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的首位。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据估计,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等举措将会在未来5年新增10万亿左右的市场空间;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将催生数个万亿级甚至更大规模的市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蓄势发力,未来10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

国高技术产业。各地各部门应对照《建议》谋篇布局,把握和做大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激活内生动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科技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强原始创新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同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合作机制,特别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国内市场规模大、韧性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应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动力源。必须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抓住经济体制、社会治理、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四是推进成果共享。《建议》鲜明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此,既要开源,通过宏观治理能力的提升,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使经济保持一定增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要拓渠,完善社会财富分配特别是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在全社会营造弘扬奋斗、鼓励创新的氛围;也要普惠,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加快教育、养老、健康、医疗、房地产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提质升级;还要兜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补上农村、边远地区、生活困难群众等短板。

五是加强安全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安全的发展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应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加强粮食、能源资源等基础领域和网络、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预防治理水平,让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建议浙江找准定位率先探索

记者:浙江省委提出,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请您谈谈,“十五五”时期浙江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赵振华:“十五五”时期,建议浙江深刻把握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以高质量发展率先探索省域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做到“经济大省挑大梁”。“十五五”期间,浙江应合理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以创新驱动提升产业附加值,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光伏、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特色产业集群等优

势领域进一步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此同时,优化人口和资源配置,通过缩小区域差距壮大整体体量,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增长空间、释放“人才红利”赋能增长动能。

其次,提升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浙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的战略枢纽,对内积极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4年出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居全国第二,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连续16年全球第一。浙江应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发挥广大浙商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提升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再次,提升发展的人文含量。《建议》指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最近,我到义乌等地调研,深切感受到,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在浙江的发展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我认为,浙江可以在人文经济学上下更大功夫,凸显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文价值。这需要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等。

最后,产出更多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样本。浙江在全国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光荣使命的省份,且入选众多国家级试点。“千万工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均发源于浙江,多次被写入国家文件。“十五五”时期,建议浙江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城乡融合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绿色低碳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事关现代化成色的关键领域先行探索,及时总结提炼相关经验,为全国提供借鉴和启示。



专家简介:赵振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四个一批”文化名家。曾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铜陵市委副书记,安徽省教育厅长等职。

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及一般项目,出版有《低效率劳动研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劳动价值新论》《党政干部关注的若干重大经济问题》等专著,在《经济研究》《理论动态》《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转载。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铸魂·我在之江学新语

■ 吴蕴贊 郭延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发又井然有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江新语》中的多篇文章,为其提供了科学指引。

强党建聚合力,提升治理效能

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一文指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要将党的领导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通过健全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确保治理方向不偏,始终围绕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推进。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强化党组织的适应性、嵌入性、整合力和引领力,使党组织能够有效统筹多元主体,实现基层治理“一核多元”,形成治理合力。

坚持人民至上。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民。《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理念,以“人人有责”激发社会成员参与热情,“人人尽责”引导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各展其能,“人人享有”确保治理成果公平惠及全民。

坚持多元协同。《为民办实事重在办事》一文强调要“发动各方面都来关心、支持为民办实事的工作”,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也要求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参与和协同作用。一方面,要通过吸纳基层新生社会力量、搭建协商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推动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形成优势互补、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构建“党组织—群团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社区‘草根’组织”的多圈层治理结构,使各方主体在治理中发挥独特功能。

强基础筑底座,厚植治理根基

夯实根基。《打牢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平台》一文强调,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窗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是要夯实基层根基,减负提升效能。在“少”字上着力减负减压,在“实”字上突出务实高效。二是要前置化解矛盾,一线解决问题。实现矛盾在基层化解、治理在一线落实。三是要锻造干部能力,培养治理骨干。要引导党员干部在一线磨炼意志、砥砺作风、真抓实干,在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能力,不断推进壮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干部力量。

科技赋能。《科技创新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一文提出了“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节约成本、降低消耗”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为社会智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要持续深化制度创新与智治融合,致力于提升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与智能化水平,使科技切实成为基层治理的“减压器”与“倍增器”。

厚植文德。《文化育和谐》一文提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文化是灵魂》一文强调,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物、整合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治理智慧,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民惟邦本”“家国一体”“以和为贵”等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以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评选道德模范,将传统美德转化为基层治理动力。

立法治促善治,稳固长治之基

健全法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立法,完善法治实施、监督、保障机制;深化基层依法治理,让矛盾化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纠纷化解在诉讼前、解决在萌芽态。

弘扬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治风尚》一文指出“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要“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引导领导干部敬畏法律、带头守法,在改革创新和矛盾化解中善用法治思维;同时强化基层法治宣传教育,促使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依法维权,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融合法治德治。《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一文指出“法律与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要“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及一致性,坚持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和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硬性的法律和柔性的规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提供规范约束,德治涵养社会风尚。在社会治理中要刚柔并济、法德共治。要在实践中注重以法促德、以德辅法,推动社会治理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作者分别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欧洲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新消费与电子商务研究院研究员)

重要论述摘编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上再上水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据新华社)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指引

专家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人文经济学

■ 胡文木 王侃

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时代课题。我们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把握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过程中确立其“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的。人文经济学是对西方经济范式的超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这一根本宗旨和基本立场。

人文经济学主张人文与经济相互依存、交融互生,绝不仅仅是强调经济学要向“人文回归”或体现“人文关怀”,也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重要的是它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逐利本性和资本至上逻辑,赋予“人文”在经济学中重要地位和更丰富的理论内涵,强调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经济发展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人文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人文与经济交融共进的双向互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也是人文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是文化与经济在总体上相互交融、互动共进,是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双向贯通、融合发展状态,它体现了经济与文化之间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始终强调经济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保障作用。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和保障了文化繁荣和精神富足。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文的繁荣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助于拓展人文传播渠道,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人文内涵。二是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具体而言,通过文化与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数字资产的结合,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降低对物质资本和常规资源要素依赖程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重塑组织运行方式,规范和调节生产主体和管理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决策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品牌市场竞争优势;通

过培养正确的价值理念和精神风貌,为生产经营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培养合作共赢、平等诚信的商业伦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摩擦损耗;通过发挥主体创造性,把艺术审美、人文风情、意志品格等精神人文要素转化为新经济形态和新产业链门类等等。三是强调在互生共荣的基础上形成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合力。人文经济学既不同于人文学,也不同于经济学,不能简单地从经济界定人文,抽离人文发展的物质基石,也不能简单地从人文界定经济,把人文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人文经济学的要义在于超越人文和经济,通过人文与经济相互融合、相互成就,实现两者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层面上的辩证统一。

将经济现象放置于整个社会宏观结构系统进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将经济领域理解为嵌入社会宏观结构中的一个特定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人文经济化和经济人文化必然构成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只有站在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系统高度,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这一对象。一方面,社会宏观结构系统虽然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子系统构成,但是,社会宏观结构系统一经形成,并在更高时空维度生成自身的运动规律,会对其子系统形成制约和支配作用。因此,一个国家、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地位、运行环境、运行规律,以及其背后蕴含的人文目的、人文价值归根到底是由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系统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内在要求国家必须从整个社会结构系统中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国家作为“有形的手”在直接或间接控制、调节经济方面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我国虽然告别了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却保留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政治传统,要求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要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对整个社会宏观结构及其发展需求的把握,更好地了解市场运行规律,进而调整、规制市场运行方式和运行方向。

(作者分别为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院长,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